

### 這本書關於什麼

某些年代的某些城市像磁鐵一般，吸引了五湖四海的追夢人。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紐約正是如此，埃利斯島 (Ellis Island) 的移民遠離他們出生的歐洲村落和貧民窟；踏進新世界等待實現美國夢。今日，這個地方則是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廣州——一個引領環球製造業龍頭的中心城市。如今的廣州以其國際機遇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國人。

廣州有為數眾多的外國人，但其具體人數卻無從知曉。根據中國 2010 年人口普查，在內地居住的外籍移民共有 594,000 人，相當於總人口的不足兩千分之一。廣州是外籍人口較多的城市。一份最近的報告顯示，在 2014 年 1 月至 8 月期間，人口約 1,400 萬的廣州接待了 305 萬出入境的外國人，其中 86,000 人已有居住登記。<sup>2</sup> 另一個網站估計在任何日子廣州城都有 50 萬外國人。<sup>3</sup> 還有一個網站認為廣州有 3.4 萬名外籍永久居民，<sup>4</sup> 而另一個網站則說是 5 萬人，<sup>5</sup> 第三個網站還說是 12 萬人，<sup>6</sup> 數字似乎高得難以置信。我們無法得到精確數字，既因為官方數據保密或無法得知，也因為許多身在廣州的外國人屬於非法居民。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不論其是否合法、人數是否確定，廣州的外籍人口儘管不少，但仍然只是中國龐大人口的滄海一粟。

這些外籍人口由許多不同國籍構成，從日本人到歐洲公司職員，乃至世界各地到這裏將中國貨出口到自己國家及地區的商人。廣州是售賣廉價仿造品的一個主要地點，這些商品出口到南亞、東南亞、拉丁美洲、尤其是中東及非洲。那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商人在此貿易中角色非凡，當中人數最多的是非洲人。

我在此書中將描述廣州的各色外國人，並探究廣州非洲商人的生活及貿易活動。在2013年至2014年間，我住在廣州小北，那裏是眾多非洲和阿拉伯人工作和休閒娛樂之地。我用「低端全球化」理論分析這些商人<sup>7</sup>——這種全球化並非表現在那些坐擁律師和廣告預算的跨國公司，而是那些買賣小量貨物的商人，在法網下於不同大洲賄賂通關代理，把貨物運回家鄉賣給街鋪攤販。這是世界上多數人經歷着的全球化。今日的廣州也許是全世界研究低端全球化的最佳地點，因為它是廣東省和珠江三角洲的商業樞紐、中國工業中心地帶，也是世界低端全球化商品買賣的中央都會。

那麼廣州的低端全球化怎樣有效地運作呢？低端全球化並非透過合同和法律來開展，而是以名譽和互信為基礎，但它怎樣跨越不同的文化背景來維繫？在此引述一位曾接受我們訪問的索馬里商人的話：你怎麼能相信一個不懂你母語的人？何況他只會講寥寥幾個英文單詞，宗教信仰也與你不同，甚至沒有信仰，抽煙喝酒跟你截然不同。此外，低端全球化在當代中國如何運作？這是一個決意推動發展進程的國家，一方面面對諸如肯尼亞和尼日利亞等法律寬鬆的社會，另一方面則與西歐、日本和美國等社會打交道。如今廣州低端全球化的最終意義是什麼？

上述議題又引發了另一些問題。本書描述的非洲人，他們不僅在廣州經商，也在那裏生活了數星期或數月，還有些人居住了數年，甚至有一些人住了十幾年以上。有些非洲人在合法或非法情況下留了下來，娶中國妻子，建立家庭。他們未來會是怎樣？中國在過去六十年間大體上是單一民族和單一文化；<sup>8</sup>而在南方的廣州則是國際化和多

元文化的城市，這對其長遠未來意味着什麼？或許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後，中國會否出現本土的巴拉克·奧巴馬 (Barack Obama)？

本書遲些才回答這些問題。我在第1章的引言先概述現時和歷史上的廣州，描繪這座城市裏的外籍人士街區，以及本書的研究方法。在第2章，我將描寫幾位住在廣州的外國人，探討「種族」、國籍和金錢在他們人生中的相互作用。接下來在第3章，我考量廣州城內的中國—非洲人際關係。我關注這些非洲人，不僅因為他們為數眾多，也因為這些來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膚色迥然不同，可能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恰恰是外族的特徵。在第4章，我研究低端全球化的議題，包括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，分析它如何體現在南中國非洲裔、阿拉伯裔商人與其中國供貨商之間的互動。在第5章，我探究非法住在廣州的逾期滯留者怎樣生存，他們怎樣搶在被警察逮捕前賺取利潤？在第6章，我會審視中間商人的角色，尤其是非洲貨運代理人，他們在中國和其民族同胞之間擔當了文化大使的職責。在第7章，我研究宗教在這些商人生活中的強大作用，不論是伊斯蘭教還是基督教，宗教信仰讓商人在茫茫異國看見道德航標。最後在第8章，我觀察中國人和非洲人之間的戀愛和人際關係。中國能否誕生自己的「奧巴馬」？還是廣州現在的全球化面貌，最終將會逐漸消失？

我是人類學家，但這本著作的書寫方式與現今大多數人類學著作不太一樣。在較早時期，諸如露絲·潘乃德 (Ruth Benedict) 和瑪格麗特·米德 (Margaret Mead) 為大眾讀者而寫作，可是如今的人類學家除了少數幾個值得關注的個例之外，幾乎全都為彼此而寫書，專業性和學術性都很強。雖然這些書的主題或許會讓大眾饒有興趣，但除非讀者是少數的專業人類學家或學生，否則它們因為其書寫風格都不容易被大眾讀者理解，我認為這是巨大的損失。畢竟工程師和外科醫生用術語寫作，其研究發明仍然能為世人所用，體現在他們建造的樓宇和執行的手術上；但如果人類學家也用術語寫作，也許他們只會被忽視。在本書中，我刻意將學術討論和引用降至最低程度，基本將其限

於尾注(如果你真的很想了解更多,希望你能延伸閱讀),並且將不同商人所說的話寫在本書的前部分和中間部分,同時我會加以自己的詮釋。但林丹、楊瑒和我所採訪的人的話語最為關鍵,因為他們來自讀者幾乎不會接觸到的世界。雖然我不知道本書是否能廣為傳閱,但它的目的也許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讓人類學「民主化」,令它在希望了解有關課題的讀者面前顯得更通俗有趣。

## 廣州印象

當人們從白雲機場乘坐地鐵或出租車來到廣州市中心,或從香港羅湖口岸乘坐高速鐵路來到,看到的盡是高聳入雲的酒店、琳瑯滿目的商場、四通八達的高架橋、樹木蔥蘢的寬闊大道,以及潔淨高速的現代鐵路和地鐵。廣州給人的第一印象,也許就是高度發展的城市,看似是發達國家典型城市的繁榮都會。

對於還記得較早期廣州面貌的人來說,當年市民身穿中山裝,街上擠滿了騎自行車者,如今的廣州城也許會讓他們嚇一大跳。我在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到廣州,看見滿城昏暗低矮的樓房、因堵塞而無法使用的廁所、戶外乒乓球檯,並對那些在市場看到的「第三世界面孔」印象深刻。我當時想,他們與香港街頭那些圓潤的面孔天差地別。在九十年代中期,我再次造訪廣州,恰巧遇到當地開張的第一間麥當勞餐廳。記得當時一名職員小聲用英文跟我說話,還有一個人也告訴我他們渴望離開中國,去美國或歐洲生活——他們帶着這個夢想來到了麥當勞。夏洛特·伊凱絲(Charlotte Ikels)在《財神歸來》(*The Return of the God of Wealth*)一書中,全面描述了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的廣州,形容這個城市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,從廣受政府管控轉為按自由市場規律運行,湧現出如今處處林立的高樓,萬象更新。<sup>9</sup>但此書中只有幾處還能浮現今日廣州的影子,這並不是因為作者的任何缺失,而是廣州在過去二十年間的變化可謂滄海桑田。

廣州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座流光溢彩的現代都市，某種程度上這令人更想進一步地細細品味這個地方，尤其是本書描述的小北地區，那裏有截然不同的景象：你仍能看見五光十色的都市霓虹燈，不過也有更貼近生活的非凡場面：播音機鳴放着《古蘭經》的吟誦，乞丐在路旁尋求施捨；兌換外幣的回族人手拿一疊疊美鈔；街頭咖啡館裏，阿拉伯人下班後抽着水煙、喝着薄荷茶；凌晨二時許，在街頭溜達的非洲人遠多於中國人，他們聚集在外慶賀着什麼。至少在這些地區，廣州似乎是世界都市而非中國城市。不止一個中國人告訴過我們：「我覺得自己在這裏像個外國人！」

伊凱絲描述九十年代廣州的某一個區，與本書展現的地方十分接近。她的另一個非凡之處在於書中沒有提到外國人。隨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放鬆入境管制，廣州在2000年代初起開始對外國人全面開放。不過，直到今天中國的人口統計數據仍不完善，直到2010年才把在華居住外籍人口納入統計。<sup>10</sup>伊凱絲沒有提到外國人，因為其人數在九十年代初可謂微不足道，但現在沒有一本書能在全面探討廣州時忽略這個群體。

外國人初次來廣州會有怎樣的感受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來自何方。一個伊朗人告訴我們：「德黑蘭和廣州的對照，就像比較一輛1950年代的汽車和一輛嶄新的奔馳。」一個也門人說：「我搬到廣州，好比從過去走到了現代，像是從洞穴中爬了出來。」另一名中東商人說：「看看那些高架橋和地鐵啊，你知不知道我們巴林根本沒有地鐵？而且這裏的女孩子幾乎沒穿什麼衣服！你剛到這裏的前兩天，會詫異地瞧見那些短裙，不過之後就習慣了。」一名肯尼亞人則更深入地分析比較了中國和自己的祖國：「你不能不折服於廣州和中國，諸如基建和城市規劃，政府能為十億人提供鐵路網絡、道路、康樂設施、公園——非洲就沒有這些東西。我在這裏從沒經歷停電。對，我想讓肯尼亞變得像中國一樣！」曾多年在英國居住的一名西非商人則有比較負面的看法：「從非洲直接來中國的非洲人覺得這裏很美

妙，而且希望中國就是這個樣子，但在歐美住過的人就不太喜歡中國。我在英國待過後，覺得中國是『翻天覆地』的不一樣，這裏並不跟從法律，合同就像廁紙一樣。」

這些言論皆反映了中國在世界的地位，它是一個發展中國家，僅在五六十年之前還有成千上萬的人經歷饑荒，<sup>11</sup>到今天卻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超級大國，並在不同領域前沿與美國競爭着統治地位。廣州作為中國最富裕和最異國的大城市之一，正是此轉型的完美典範。

### 廣州外國人的簡史

外國人長久以來把廣州稱作「Canton」，它作為對外貿易中心已有約兩千年歷史，「是通向中國內陸的沿海口岸。」<sup>12</sup>據稱，古羅馬商人曾到過廣州，廣州在唐朝曾有非洲奴隸出現，<sup>13</sup>另外還有阿拉伯商人。<sup>14</sup>那時廣州人口估計有20萬，當中外國人上萬名，包括波斯人、馬來人和僧伽羅人。<sup>15</sup>廣州的商業貿易在十二世紀蓬勃發展，但後來逐漸式微。1367年，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禁止所有中國商賈與外國進行貿易。十六世紀初，隨着歐洲商人逐漸到來，尤其是葡萄牙人，<sup>16</sup>以及十七世紀初來華的荷蘭商人，貿易漸漸復蘇。直至十八世紀末，「那口岸文匯着各種語言，包括葡萄牙語、西班牙語、北方漢語、粵語、中式英語、馬來語和印度語，播散從歐洲和大洋洲傳來的各式詞語。」<sup>17</sup>廣州再次成為非常國際化的都會。

1757年，清廷頒布旨在把洋人對中國影響減至最低的法令，規定西洋商人只可在廣州通商；又在1759年規定洋商必須在廣州城外一處被稱為「十三行」的商館區從事貿易和居住，並禁止在廣州過冬，非貿易季節須遷至葡萄牙佔領的澳門。中國「公行」負責徵收關稅，確保洋商舉止端正，並處理所有貨運及通訊活動。講中式英語（洋涇濱英語，Chinese Pidgin English）的中國「翻譯人員」翻譯各類文件，同

時也協助洋人與粵海關(西方人稱之為「Hoppo」,從「戶部」一詞派生而來)之間的溝通。粵海關的職能是監督洋商活動,「其貪腐之極惡名昭著。」<sup>18</sup>清政府禁止洋人學習中文,也禁止華人學習外語,那些翻譯人員和其他官員則除外。十八世紀時期,廣州口岸的關稅雖然也許全球最高,卻也沒能阻止外國商船紛至沓來。1784年曾有這樣一番景象:「那裏至少有四十五艘船拋錨在岸,排開的隊伍有三英里長。」<sup>19</sup>直至十八世紀中葉,絲綢是中國主要外貿商品,後來被茶葉所取代。

十九世紀初,在廣州的英美商人留下了不少歷史記錄,從他們與洋行的有限交流中,可以了解到他們在中國南方的經歷。六位學者在這些記錄中注意到,替這些洋人做生意的華商中介人十分腐敗,但他們「在不少事務上提供了無價的建議,例如市場形勢和中國規則的細節」。<sup>20</sup>到了1830年代和1840年代公行沒落,其在外商和華商之間的中介角色,由外商僱傭的華籍買辦(compradors)取代。幾個文獻記錄都指出,十三洋行的安排頗為得當;但當年清朝政府禁止外國婦女在廣州出現,也嚴禁華人與外國人戀愛結婚。

十九世紀美國商人威廉·亨特(William C. Hunter)在其著作中,描述了他於1825年至1844年間在廣州生活的見聞。他指到廣州的美國商船,「每年帶來了大量的西班牙和墨西哥銀圓,以彌補相對很少的進口貨品產生的赤字。」<sup>21</sup>西方人對茶葉等中國商品的需求非常大,但中國人卻沒有從西方進口同等大宗的商品。面對貿易失衡,英國人的解決方式是輸入鴉片。鴉片戰爭在1839年底爆發,大英帝國基本上強迫清朝不再針對鴉片問題執法。英國出口大量鴉片到中國,導致大批中國人鴉片成癮,亦逆轉了英國對華的貿易失衡。<sup>22</sup>清朝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,並被迫在廣州以外開放幾個港口予英國貿易通商。鴉片戰爭導致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歐洲列強瓜分中國,隨後日本也侵略中國,從此中國人持續對西方和外國世界不信任。百年的民族恥辱,導致直到現在中國政府仍常常以此來鼓動愛國熱情。

1857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，廣州沙面島建立了一個外國人聚居地，該租界屬於英國和法國，島上的西洋建築風格隨後影響了整個城市。<sup>23</sup>到了二十世紀初，上海取代廣州成為了中國異域的中心。在二十世紀上半葉，廣州很多知識分子主張擯除外國影響，廣州因此被稱為「中國人仇外的典型」。<sup>24</sup>但最近有論者指出上述觀點是錯誤的，認為廣州的普及文化「深受西方影響」。<sup>25</sup>但伴隨着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的到來，外國人被驅除出境。「中國在1949年後鎖國，向資本主義世界關閉了國門，再沒有供中間人聯繫境外的角色。」<sup>26</sup>共產政府把廣州的英文名稱由Canton改為Guangzhou，並在1950年至1951年間把外國人驅除出境，廣州的國際化面貌因此消失。直至1978年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，廣州的大門才再次開啟。然而，直到再過二十年後珠江三角洲成為世界工廠，外國人才開始蜂擁進入廣州。

正如本書所述，外國商人的存在早已有很悠久的歷史先例，但古今比較卻有一些頗突出的相似之處。正如傅高義(Ezra F. Vogel)寫道：「數個世紀以來，廣州人在進行大宗貿易上頗為成功，但同時又盡量少地與外國人進行人際和文化上的交流。」<sup>27</sup>十三行時期這種情況非常顯著，洋商聚集在那段短小的河岸旁，完全依賴公行及翻譯人員簽下對華合同。今天，本書中探討的非洲和阿拉伯商人仍然如此，雖然中國政府並不限制他們與其他人交流，但他們與中國人之間還是有一道鴻溝，許多此類商人都提到他們沒有中國朋友（也許除非有女朋友，這與兩百年前的洋商不太一樣）。

另一個呼應歷史之處是貿易失衡。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，英國沒有中國人需要的商品，因此轉向鴉片貿易，這種情況在今日有另一種形式——中國需要非洲的原材料，同時向其供給工業製品。本書描述的商人，正如上述兩百年前在中國的一些洋商，把錢帶到中國，然後把貨品運回家鄉。偶爾一些非洲商人茫然地向我們傾訴：「為什麼我要跨越半個地球，來這裏買手機、衣服、建築材料、家

具？為什麼我的祖國不能用廉宜的價錢製造這些東西？」為尋求答案，他們也許會討論西方殖民主義對其國家的背信棄義，或是其國家政府的無能；又或是他們聳聳肩，認為這就是全球化的奇怪之處，說不定兩百年前的廣州洋商也這麼認為。

## 廣州的異域

外國企業的職員和專業人員造訪中國時，也許會去北京和上海。可是，多數商人不會去這些城市尋求生意。廣州是最佳的商貿地點，尤其是低端貿易，它在2013年的對外貿易金額佔到全國的四分之一——儘管外貿數字不免有失精確，尤其在低端全球化領域而言。<sup>28</sup>上海和北京都是商業大城市，但卻沒有廣東省所擁有的龐大工廠，也沒有那麼多的外國商人。中國唯一能與廣州媲美的城市是浙江義烏，它也吸引了許多從發展中國家而來的商人。這個距離廣州十七個小時長途巴士車程的城市，有巨型的外貿市場，以小商品和廚具用品貿易聞名遐邇。廣州周邊城市也聚集了許多尋求其他產品的商人，許多商人知道要去佛山買陶瓷，去東莞買鞋子，去深圳買電子產品。然而，廣州仍然是外貿的中心城市，尤以成衣著名。你還可以在廣州買到任何能想像出來的產品，供應商會為你提供從太陽能燈管、重型機械、家具、電子產品、鞋子到書包的特色商品。

廣州是一座包含各色街區的大城市，但多數街區是外國人從來不會去的，他們只在幾個處所出入。廣州不同族裔的群體去不同地方做生意和娛樂。

這些地點中最高檔的是珠江新城，與書中描述的主要地點相距幾英里，僅是幾個地鐵站的距離而已。它是廣州城的高端外貿中心，很多歐洲人、日本人、拉丁美洲人在這裏生活，也是許多中國人享受異國特色的地方。在這裏看到的外國人，大多來自發達國家。這裏有外國人尤其喜歡的奢華購物區和住宅公寓，酒吧區在地鐵站附近，